

名誉主编 巴金

# 春天的旅行

收获文库  
wenzku shouhuo  
散文卷 2

文汇出版社

# 春天的旅行

收获文库

散文卷 2

名誉主编 巴金 主编 李小林 肖关鸿 肖元敏



文汇出版社

《收获》文库●散文卷·2

## 春天的旅行

名誉主编/巴金

主 编/李小林 肖关鸿 肖元敏

选 编/许国良

责任编辑/戎思平

封面装帧/袁银昌

出版发行/**文匯**出版社

上海市虎丘路50号

邮政编码:200002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/复旦大学印刷厂

版 次/1998年8月第1版

印 次/1998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/850×1168 1/32

字 数/400,000

印 张/16.375

印 数/1-5000

ISBN7-80531-565-5/I·65

定 价/32.00元

## 代序

想着《收获》，我不能不想到靳以，他是《收获》的创办人，又是《收获》的主编，我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助手。他用自己的心血哺育这个新生的孩子，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，不声不响地献出全部精力。多出人，多出作品，这就是他的雄心壮志。五个人办这样一个大刊物，他并不感到工作繁重。他发病住院的时候还在看校样，写信组稿。虽然刊物也遇到一些麻烦，但是在在他一生创办的刊物中，《收获》算是办得最顺利，而且销路最大的了。没有想到，他为这个刊物工作的时间就只有短短的两年，刊物按照他的希望成长发展，走上自己的道路，他却意外地闭上了眼睛。他留给我做的头一件事便是《收获》的第一次停刊。事情发生在他逝世后一年。

1964年1月，《收获》在上海重现。人们称它为“新收获”，或者“小收获”，它不是原来的《收获》，中国作协也没有复刊的计划。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，上海作协分会将别的杂志停刊，改出“新收获”，记得是以群在领导，肖岱同志做实际工作。但是“大写十三年”的口号已经提出，在张春桥、姚文元虎视眈眈的目光下，刊物注定要走向毁灭，努力和挣扎都没有用，不到两年半的时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式开锣，不但“新收获”给革命左派砸烂，连以群也挨批挨斗、跳楼身亡。在“文革”期间我才知道“新收获”为了发表我的文章，曾遭到张春桥的训斥。

《收获》第三次出现，在1979年1月。它是上海的《收获》，不过

复刊在乌云消散、蜘蛛网砸烂的时候。新的《收获》仍然走着团结作者、为读者服务的道路，严肃地、沉默地一步一步地前进。路越走越平坦，脚步越走越踏实，刊物同读者、同作者的联系愈来愈密切。仿佛一闪眼间新的《收获》就到了第九个年头，前面一片亮光。刊物在读者中间扎了根，孩子一天天发育成长，难道我不高兴？这些年我再也看不见黑蜘蛛的阴影，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地听老爷们的训斥，难道我不高兴？

我高兴。但是对刊物的发展，我并不曾尽过力，我也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言。要是勒以能活到现在，那有多好！他做了一件好事，人们不会忘记他。我又老又病，作为挂名的主编，我应当休息了。我羡慕正在为刊物工作的同志们，刊物走上了一条宽广的路，你们的心血并没有白费。只要能团结人，只要不脱离读者，你们会得到支持的。

巴 金

注：本文摘自《〈收获〉创刊三十年》

# 目

# 录

1. 巴 金 代序

## 1979 年

- |     |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
| 1.  | 罗 荚 | 三个收获       |
| 6.  | 老 舍 | 我怎样写《骆驼祥子》 |
| 11. | 曹 禹 | 简谈《雷雨》     |
| 14. | 夏 衍 | 悼念田汉同志     |
| 22. | 黄 裳 | 过去的生活      |
| 40. | 刘 真 | 怀念赵树理同志    |
| 44. | 梁 斌 | 两走白洋淀      |
| 58. | 胡絜青 | 悼亡友于立群     |
| 67. | 巴 金 | 斯以逝世二十年    |
| 69. | 王西彦 | 回忆荃麟同志     |

## 1980 年

- |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
| 86. | 丁 玲 | 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 |
| 91. | 方 敬 | “地之子”       |

- |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
| 100. | 郁 云 | 我的父亲郁达夫    |
| 112. | 钦 文 | 我又到了老虎尾巴   |
| 118. | 张 洁 | 盯梢         |
| 126. | 王维玲 | 回忆柳青同志     |
| 146. | 徐 迟 | 法国,一次春天的旅行 |

### 1981 年

- |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
| 186. | 冯骥才 | 书桌          |
| 193. | 陈学昭 | 痛悼我的长者茅盾同志  |
| 200. | 荒 煤 | 一颗企望黎明的心    |
| 213. | 李健吾 | 忆西谛         |
| 220. | 郁 云 | 鲁迅与父亲郁达夫的友谊 |
| 228. | 冰 心 | 我到了北京       |
| 233. | 谌 容 | 她在国外        |
| 250. | 叶圣陶 | 内蒙日记        |

### 1982 年

- |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307. | 茹志鹃 | 阿卫           |
| 317. | 叶君健 | 重返剑桥         |
| 336. | 廖静文 | 往事依依         |
| 437. | 谢和赓 | 王莹写《宝姑》的前前后后 |
| 448. | 李 黎 | 巴黎的鲜花        |
| 454. | 叶圣陶 | 渝沪通信         |
| 505. | 袁 鹰 | 散文求索小记       |
| 515. |     | 编后           |

罗 荏

## 三个《收获》

《收获》又重新复刊了，感到又是高兴，又是欣慰。她的再生，使社会主义百花园中增加了一株鲜艳的新花。为她的再生，衷心的祝贺更加茁壮；为她的再生，引起我对《收获》的创始人靳以无限的怀念。

靳以离开我们近 20 年了，在这些岁月中，我们经历了一场惊涛骇浪的锻炼和考验。当他得知《收获》的再生，他会感到极大的欣慰。感谢华主席、党中央彻底粉碎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法西斯统治，才使《收获》得以第三次同读者见面。

最初孕育这个大型文学刊物，是在 1956 年的春天，我和靳以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会议。有一次白羽和荃麟来到我们的住地，打开了话匣，谈到了创作，谈到了刊物，谈到了靳以在 30 年代主编的《文学季刊》，谈到了它在当时有着很大影响。不仅是因为她是一个大型的刊物，特别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。也谈到了当前的许多文艺杂志，还缺少各自不同的风格。

靳以对办刊物有他独到的见解和特殊的兴趣，话头也就多起来了。大家取得了一个共同的意见：就是希望他负责主持一个大型的、有独特风格的文学刊物。靳以接受了大家的意见。他答应认真考虑一下，再具体提出一个计划来讨论。

这就是第一个《收获》的最初的孕育。

当年的秋天，我们又有机会在北京聚晤，这个议题也就很自然

的谈起来了，而且靳以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设想。认为作家写出了长篇小说、话剧剧本、电影剧本，最好能够在正式出版和上演之前，发表在刊物上，这样可以得到广大读者的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，有助于作者进一步加工修改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，也正是将要办的大型刊物的责任。

对于这个尚未诞生的婴儿，靳以也已为她取了一个极好的名字：“收获”，这个名字正是为了说明社会主义文艺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，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，深入到农村、工厂和部队的现实斗争生活中，正在不断地写出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来，因而特别需要提供相与适应的阵地。

大家都十分赞赏为这个新杂志所题的名字，并预祝她将以新的姿态、新的风格出现在中国文坛上。

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，终于在 1957 年 7 月 24 日创刊了。她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，而在上海编辑的。刊物的主编是巴金和靳以。他们两位在解放前一同合作主编了多种文学杂志的。

靳以在编辑工作上总是亲自动手的，建立了一个精兵简政的编辑部，他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和编后记，他亲自写信向全国作家约稿，并担任阅稿、复信等大量的工作。

他在《发刊词》写的第一句话：

《收获》的诞生，具体实现了“百花齐放”的政策。

正当他写《发刊词》的时候，6 月 19 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毛主席的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。他认真地学习了，而且把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项标准，写进了《发刊词》，要求刊物发表的作品，“应该符合毛主席所提出的六大标准”。同时，又写上了十分重要的一段话：“在这个明确的政治标准之下，作家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体裁，不同的形式，甚至不同的流派。”

我认为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话，因为在写《发刊词》的时候，也正是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，他仍然本着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

鸣”的精神,要使刊物能在总的政治方向的指引下,有自己的风格和独创的性格,坚持这一点精神,也不是容易的。他提出来了,写在《发刊词》里了,创刊号也正是本着这样一个精神组织稿件的。

第一篇带头文章,是未发表过的鲁迅的一篇重要的讲稿: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。

这一期发表了艾芜的反映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《百炼成钢》。老舍的三幕话剧《茶馆》,这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剧本。作者通过一家茶馆,反映了从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,整整半个世纪的中国这个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姿态。这一期还发表了柯灵的电影剧本《不夜城》;巴金的谈创作的文章:《和读者谈谈〈家〉》等。对于老作家谈自己创作体会的文章,是为读者所喜欢的栏目。巴金在《收获》上先后还发表谈《春》和《秋》的文章。

从创刊号的内容来看,确实是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,特别是她突破了一些框框,具有独自的风格。同时,在团结老作家,扶植青年作家方面,作了不少工作。尤其是靳以本人总是亲自写信约稿,复信回答问题,不断受到作者的赞赏。

从《收获》创刊以来,靳以用他的全部精力投在主持刊物的工作上,对来稿的态度是十分认真、严肃的,当他看出作品在思想倾向上有缺点时,他总是热情的亲自写信给作者,即使是他的老朋友,或者有地位的老作家,也总是有原则的对待他们的来稿。如有首长诗,是出自名诗人之手,当他看出这首诗在思想倾向上是有毛病的,他说如果就这样发表出去,对作者对刊物都是不利的,他终于写了一封热情的信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果然,后来这位诗人对于当时没有发表出来,表示了衷心的感谢。

靳以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,由于他的爽朗的性格和乐观主义的精神,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。1959年,他的心脏病连续发了两次,医生已经警告他不能再连续工作,超过自己体力的负荷。但是他除了编辑工作外,还要主持作协的工作,还有接待外

宾的任务。10月，是新中国的10年大庆，外宾特别多，他总是坚持抱病参加接待，有一天他送一位朝鲜的客人到火车站，还没有走进车站，就发病了。这是他在这一年中第三次发病，住进了医院。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，但是他自己却很乐观，稍稍一恢复，他又是精神抖擞的要出院工作了。还是主治的医生根据他的病情，坚决不同意他出院，他才不得不仍在医院里住下来。但是他并没有休息，坚持要编辑部把来稿送给他看。可以说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仍然以他全副的精力放在编辑工作上，终于在11月7日的子夜发病，不及抢救而与世长辞了。他编完了1959年的最后一期《收获》，就离开了我们，至今已将近20年了。

当然，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。努力办好刊物，对于繁荣和发展文艺创作有着很重要的作用。例如《收获》第一年出了3期，收到600多篇来稿，其中长篇和中篇小说就有133部，话剧和电影剧本有53部，说明创作上的收获是很可观的，刊物起着巨大的组织作用。

第一个《收获》，是从1957年7月创刊到1960年5月停刊，出版了3年，一共发表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，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。

《收获》停刊后，不断收到读者和作家们的来信，希望能够复刊。经过讨论，决定在1964年初恢复了《收获》。只是原来的《收获》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，编辑委员会的编委是包括了全国的作家在内的。1964年复刊的《收获》，是作协上海分会的刊物，编委的人选也限于上海分会的作家。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《收获》也就在林彪和“四人帮”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的大棒之下，被迫停刊了。

这就是第二个《收获》的始终。

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时期，它的追随者们，抓住了《收获》，恶狠狠地诬蔑说她是一本“资产阶级的同

人刊物”，是“发表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的黑刊物”等等。

但是，历史无情。“四人帮”及其一伙追随者以及他们所办的帮刊，统统都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。
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今天，第三个《收获》的重新出版，正好说明她是经受了群众的严格的检验，并且给予了公平的正确的评价。

最后，我想借用靳以在《发刊词》里讲的一句话，改了几个字，用以祝贺第三个《收获》的新生：

《收获》的再生，又一次实现了“百花齐放”的政策。

(1979年第1期)

## 老 舍

##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

从何月何日起，我开始写《骆驼祥子》？已经想不起来了。我的抗战前的日记已随同我的书籍全在济南失落，此事恐永无对证矣。

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。在写它以前，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，写作为副业，从《老张的哲学》起到《牛天赐传》止，一直如此。这就是说，在学校开课的时候，我便专心教书，等到学校放寒暑假，我才从事写作。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，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，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，有损于健康。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，我已经有了去作职业写家的心意；经好友们的谆谆劝告，我才就了齐鲁大学的教职。在齐大辞职后，我跑到上海去，主要的目的是看看有没有作职业写家的可能。那时候，正是“一·二八”以后，书业不景气，文艺刊物很少，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冒险。于是，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。我不喜欢教书，一来是我没有渊博的学识，时时感到不安；二来是即使我能胜任，教书也不能给我像写作那样的愉快。为了一家子的生活，我不敢独断独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，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。

事有凑巧，在山大教过两年书之后，学校闹了风潮，我便随着许多位同事辞了职。这回，我既没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，也没同任何人商议，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，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。这是“七七”抗战的前一年。《骆驼祥子》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。这一炮

要放响了，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，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。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，我便只好再去教书，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。所以我说，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。

记得是在民国 25 年春天吧，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，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。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，又卖掉，如此三起三落，到末了还是受穷。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，我当时就说：“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。”紧跟着，朋友又说：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，哪知道，转祸为福，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，偷偷地牵回 3 匹骆驼回来。

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？哪里的人？我都没问过。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驼。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。

从春到夏，我心里老在盘算，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，成为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。

不管用得着与否，我首先向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。齐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，山下有许多家养骆驼的。得到他的回信，我看出来，我须以车夫为主，骆驼不过是一点陪衬，因为假若以骆驼为主，恐怕我就须到“口外”去一趟，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。若以车夫为主呢，我就无须到口外去，而随时随地可以观察。这样，我便把骆驼与祥子结合到一处，而骆驼只负引出祥子的责任。

怎么写祥子呢？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，好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。把他的地位确定了，我便可以把其余的各种车夫顺手儿叙述出来；以他为主，以他们为宾，既有中心人物，又有他的社会环境，他就可以活起来了。换言之，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；写别的人正所以烘托他。

车夫们而外，我又去想，祥子应该租赁哪一车主的车，和拉过什么样的人。这样，我便把他的车夫社会扩大了，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绍进来。可是，这些比他高的人物，也还是因祥子而

存在故事里，我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。

有了人，事情是不难想到的。人既以祥子为主，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。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，我便能把祥子拴住，像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。

可是，人与人，事与事，虽以车为联系，我还感觉着不易写出车夫的全部生活来。于是，我还再去想：刮风天，车夫怎样？下雨天，车夫怎样？假若我能把这些细琐的遭遇写出来，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为一个最真确的人，不但吃的苦，喝的苦，连一阵风，一场雨，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。

由这里，我又想到，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。他也必定有志愿，有性欲，有家庭和儿女。对这些问题，他怎样解决呢？他是否能解决呢？这样一想，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。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，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，那些小事情了，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。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，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。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，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。

由民国 25 年春天到夏天，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，把祥子的生活与相貌变换过不知多少次——材料变了，人也就随着变。

到了夏天，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。因为酝酿的时间相当的长，搜集的材料相当的多，拿起笔来的时候我并没感到多少阻碍。民国 26 年 1 月，“祥子”开始在《宇宙风》<sup>①</sup> 上出现，作为长篇连载。当发表第一段的时候，全部还没有写完，可是通篇的故事与字数已大概的有了准谱儿，不会有很大的出入。假若没有这个把握，我是不敢一边写一边发表的。刚刚入夏，我将它写完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据查《宇宙风》是 1936 年 9 月第 25 期开始连载，至 1937 年 7 月 16 日第 45 期共刊载 21 段，因“七七”事变而中断。

共 24 段，恰合《宇宙风》每月要两段，连载一年之用。

当我刚刚把它写完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了《宇宙风》的编辑：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。后来，刊印单行本的时候，书店即以此语嵌入广告中。它使我满意的地方大概是：（一）故事在我心中酝酿得相当的长久，收集的材料也相当的多，所以一落笔便准确，不蔓不枝，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。（二）我开始专以写作为业，一天到晚心中老想着写作这一回事，所以虽然每天落在纸上的不过是一二千字，可是在我放下笔的时候，心中并没有休息，依然是在思索；思索的时候长，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。（三）在这故事刚一开头的时候，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。在往常，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，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。有时候，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，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，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。这，往好里说，足以使文字活泼有趣；往坏里说，就往往招人讨厌。“祥子”里没有这个毛病。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，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，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。这一决定，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，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，心中有话可说，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。（四）既决定了不利用幽默，也就自然的决定了文字要极平易，澄清如无波的湖水。因为要求平易，我就注意到如何在平易中而不死板。恰好，在这时候，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。在平日，我总以为这些词汇是有音无字的，所以往往因写不出而割爱。现在，有了顾先生的帮助，我的笔下就丰富了许多，而可以从容调动口语，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，新鲜，恰当，活泼的味儿。因此，“祥子”可以朗诵。它的言语是活的。

“祥子”自然也有许多缺点。使我自己最不满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。因为连载的关系，我必须整整齐齐的写成 24 段；事实上，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。这，可是没法补救了，因为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。

“祥子”的运气不算很好：在《宇宙风》上登刊到一半就遇上“七七”抗战。《宇宙风》何时在沪停刊，我不知道；所以我也不知道“祥子”的全部登完过没有。后来，《宇宙风》社迁到广州，首先把“祥子”印成单行本。可是，据说刚刚印好，广州就沦陷了，“祥子”便落在敌人的手中。《宇宙风》又迁到桂林，“祥子”也又得到出版的机会，但因邮递不便，在渝蓉各地就很少见到它。后来，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纸型买过来，它才在大后方稍稍活动开。

近来，“祥子”好像转了运，据友人报告，它已被译成俄文、日文与英文。

(1979年第1期)